

国家意识在翻译教材编写中的内化建构研究

叶小妹 汪华

(南昌航空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63)

【摘要】教材建设是高等学校三大建设(师资、设备、教材)之一。教材是教师设计和实施教学活动最主要的依据,也是学生借以获得课程经验的中介和手段。在大思政背景下,教材的价值蕴含更加凸显。本论文探讨在翻译教材编写中融入思政元素,加强国家意识在翻译教材中的内化建构,为翻译教材建设与翻译教学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法,为国家培养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国家利益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等德才兼备的人才,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家意识; 翻译教材编写; 思政元素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要充分发挥各类课程的育人功能。

教材建设是高等学校三大建设(师资、设备、教材)之一。教材是教师设计和实施教学活动的最主要的依据,也是学生借以获得课程经验的中介和手段。教材建设的好坏也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教材也是价值引领的重要媒介,对学生“三观”的形成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大思政背景下,教材的价值蕴含更加凸显。

但现有的一些教材在意识形态等方面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仅没有起到价值引领作用,而且适得其反,误导学生。正因为如此,教育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学者对所有的大中小学教材进行意识形态专项排查,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江西省教育厅组织的高校教材审核活动,发现某些外语教材中在选材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价值导向不正确,甚至有美化西方、造成中国文化失语的倾向。在大思政背景下,在教材编写建设中,如何实现学科知识与思政元素的无缝对接,发挥教材育人功能,形成知识传授、能力达成和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本论文以翻译教材建设为例,拟探讨在翻译教材编写中融入思政元素,加强国家意识在翻译教材中的内化建构。当下我国翻译教材建设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向世界译介中国”,“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等伟大构想已将中国的翻译实践提升至国家语言战略的高度,对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理念的解释权和话语权必须

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在此宏大时代背景下,翻译教材建设和翻译教学必须体现时代所赋予的重大使命,纯粹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教学内容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知识技能培养的大前提必须是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国家意识。只有具备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坚定的国家利益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等,才能确保学生以坚定的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认知和认同为己任,客观辩证地在语言学习、文化比较上实践中西方互学互鉴[杨枫 2020:2],在面对文化冲击和意识形态干扰时坚持理性的民族身份认同和中华文化立场,成为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责任担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一、翻译教材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及研究动态

在翻译研究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翻译教材建设问题也逐渐引起了翻译界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国外,以 James Holmes, Jeremy Munday, Andre Chestennan 和 Dina Nikouliteheva 为代表。1972 年 James Holmes 在其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概念。他认为“翻译研究”由“纯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两部分组成。后者进一步分为四个次范畴:译者培训、提供翻译工具、制定翻译政策和翻译批评(1988)。Jeremy Munday(2001)把教材列入翻译培训的分支——课程设计,认为笔译和口译教材要分别编写和出版。Andre Chestennan (1994)探讨了翻译教学原则,指出翻译教材编写应该有典型翻译错误分析的内容。Dina Nikouliteheva 在其论文“Making Translation Textbooks”(2002)中指出,翻译教材应该覆盖应用翻译的方方面面,翻译教材的编写应该根据社会的需求。

相对国外研究,国内对翻译教材的研究比较全面,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对翻译教材的介绍

和评价(穆雷,1995)。(2)翻译教材中存在的问题:①翻译教材中的译文或译例不准确,不规范(黄卫峰,2003)。②翻译教材的概念和内容传统陈旧(罗选民,2002)(马鸣,2006)。③翻译教材理论基础薄弱,缺乏系统性(杨自俭,2006)(王金波、王燕,2010)。(3)对翻译教材的调查研究(张泽民,2007)。(4)翻译教材的编写原则:王树槐根据目前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及汉英翻译教学的特点,提出汉英翻译教材编写的系统性原则和链接性原则(王树槐,2011)。高路认为,应该将德国功能学派代表翻译家莱斯的文本类型理论应用于翻译教材编写,在编写过程中以文本为单位,注重培养学生的文本意识和文本类型分析能力,让学生从文本特征和文本功能的角度思考翻译策略、指导翻译评价,不仅能使翻译教材更具实用性和针对性,还可以真正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批评能力、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实现教学大纲提出的教学目标(高路,2011)。王建国探讨了功能翻译理论与我国的翻译教材建设,认为在翻译教材编写当中,必须注意具体的翻译要求,引例必须给出尽可能多的语境,引例的选择必须考虑文本功能,理论教学只能靠教师在讲授引例时进行理论渗透,重视文化教学和翻译规约的作用(王建国,2004)。陶友兰借用德国 Vermeer 提出的目的论为指导,对中国翻译教材(主要是英汉双语翻译教材)的建设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就如何编写适合作为翻译专业教学的翻译教材提出如下建议:1)教材中要重申翻译的内涵和外延,拓展翻译概念;2)教材中要提出多元化翻译标准,允许采取多种翻译策略;3)教材中要凸显译者,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4)教材编写要作需求分析,反映用户意向(陶友兰,2006)。

国内系统研究翻译教材的专著有张美芳教授于2001年出版的《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1949—1998)》,主要是以1949年至1998年在我国出版的、以讲述英汉/汉英翻译方法与技巧为主的专著为研究对象,追溯翻译教材的形成过程和分析影响其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教材进行分类和分析,并提出翻译教材改革建议。另外还有陶友兰的博士论文“试论中国翻译教材建设之理论重构”(2001),首先对翻译教材建设进行重新定位,首次提出翻译教材建设应纳入霍尔姆斯的应用性翻译研究范围,从而确立其重要性和很强的实践性,进一步推动我国应用性翻译理论的发展。然后梳理了五条基础理论,即德国翻译“目的论”、交际学理论、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可读性理论和市场理论。

从上述文献可知,翻译教材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无论是评价现有的翻译教材,还是指出翻译

教材的编写原则或编写体系,都对翻译教材编写有指导作用。但现有的翻译教材研究都没有涉及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教材体系这一具有时代性意义的话题。本论文研究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拟探讨国家意识在翻译教材编写中的内在建构。

二、国家意识在翻译教材编写中的内在建构

课程思政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课程思政是一种全新的课程观,更是回归教师的初心,是“传道授业解惑”,立德树人守初心,教书育人。

国家意识是思政元素的核心内容,是夯实课程思政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十三五”规划纲要建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增强国家意识。什么是国家意识?国家意识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在长期生产、生活、教育实践中,基于对国家的产生、发展、实质等根本问题的科学认知和正确理解而形成的对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国家发展、国家形象、国家责任等的正确认识和理性实践,既是树立正确国家观的理论前提,也是从情感、心理上实现对国家认知认同的理论基础,还是形成爱国主义思想、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进步的理论源泉(王友永,2020)。国家意识,“是对某一特定的民族国家及其传统、制度、文化的归属,并由此而分享一种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情感、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于海,2004),它是对国家认知、认同和期待的一个概念集合。就今天而言,国家意识的内涵就是我们今天提倡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建立我们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诚如杨枫(2020)所言,今天的这种国家意识具有丰富而饱满的理论涵摄力,既可以统领外语学术生产和教学实践,也可以指导课程思政建设和立德树人工程。本论文将试图把以国家意识为核心的思政元素融入翻译教材编写中,指导翻译教材建设,指导翻译教学,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

(1)翻译教材思政元素的挖掘:教学内容是决定思政教育的关键所在。应该对教学内容精心挑选和设计,做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有机结合。翻译教材内容从下列题材中选取以国家意识为核心的思政元素:1)展示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反映时事政策的时文,如中国政府白皮书、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报导、CGTN新闻等,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加强国家意识教育,培养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四个自信等;2)反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核心思想观念的典籍,如《论语》和《道德经》等,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即“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具有天下性、道德性、社会主义性,强调国家意识中的爱国、爱民、爱人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3)具有红色基因的中国故事,如抗日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抗洪抢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疫精神等,强调国家意识,学习爱党爱国爱民,树立坚定的国家利益意识。

(2) 翻译学科知识与思政元素的有效融合路径研究:课程思政教学要避免知识传授与思政教育两张皮的现象。同样地,翻译教材编写建设也要把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学科知识中。从教学视角和学科视角研究课程思政翻译教材内容呈现的方式与优化策略,如:把思政元素巧妙地融进翻译技巧的讲解中,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思政效果;在翻译练习中,可以精选与课程主题相关兼具育人元素的材料,既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又加强学生的国家意识教育,为国家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三、本论文研究对促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和意义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教育改革都离不开与之相关领域的研究。教材作为一种教学要素和其他要素共处于一个教学系统中,势必要对系统其他教学要素产生重要影响和作用。教材是组成教学过程的四个基本要素之一。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教材本身结构和功能变得日益复杂,要求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1) 传统的翻译教材编写着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凸显教材的知识传授功能,而对教材的价值引领作用重视不够,甚至在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大思政背景下,现有的翻译教材研究都没有涉及如何把思政元素融入教材体系这一具有时代性意义的话题,本论文研究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国家意识是思政元素的核心内容,是夯实课程思政的理论基础。本论文探讨国家意识在翻译教材编写中的内在建构,为翻译教材建设与翻译教学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法,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2) 本论文研究以国家意识为核心的思政元素纳入翻译教材编写中,加强国家意识在翻译教材的内化建构,有助于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实现知识传授、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的多元统一,使学生审视自己的初心和新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及挑战,思考国家意识的时代内涵,即爱国主义精神、国家利益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等,为国家培养

德才兼备的人才。

(3) 在本论文实践中,将编写一本校内非英语专业一、二年级学生使用的融入以国家意识为核心的思政元素的大学英语四、六级翻译教材,有助于提高学生英语四、六级考试水平和通过率。

四、结语

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正面临重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际社会正前所未有急于了解一个真实、立体的中国,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译者已被赋予向世界译介中国的时代重任。因此,现在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在翻译教材编写中融入思政元素,加强国家意识在翻译教材中的内化建构,凸显翻译教材的价值蕴含,培养复合型人才,具有坚定的国家意识,以国家尊严、民族利益为重,同时也兼具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 [1] 杨枫.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文化政治学阐释[J].当代外语研究 2020 (6): 1-2.
- [2] 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74.
- [3] 穆雷.翻译教材编著中的理论指导——介绍《英汉互译教程》[J].中国翻译,1995 (4): 34-36.
- [4] 王树槐.论汉英翻译教材的编写原则[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1 (2): 85-91.
- [5] 张美芳.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25-26.
- [6] 陶友兰.试论中国翻译教材建设之理论重构[D]. 博士学位文,复旦大学,2006:71-72.
- [7] 王友永.国家意识的科学内涵及其培养[J].思政学者.2020:30-31
- [8] 于海.民族精神意涵:国家意识、文化认同、公民意识[J].思想理论教育,2004 (12): 3-9.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23 年南昌航空大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国家意识视域下课程思政融入翻译教材建设的实现路径研究”(编号为 Jy233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叶小妹: 硕士,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英语教改研究、英美文学。汪华: 硕士,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英语教改研究、翻译、语言学。